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苑利¹ 顾军²

(1.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2.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100083)

内容提要: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渐入学界视野。非遗保护应该“原汁原味”,又要“活态传承”。中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而既有学科又无法为非遗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作为一门新学,非遗学不仅具有百年以上的学术积淀、十余年的教学实践,而且还具有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学术视角与视野以及独特而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一切,都为非遗学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非遗保护 活态传承 原汁原味 学科建设理论架构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9月22日,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代表中国文化教育界,向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关于《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的重要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冯骥才先生重点谈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以下简称“非遗学”)学科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人才培养问题^[1]。紧接着,2020年底,天津大学连续两次举办申请新增非遗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专家论证会,同年12月24日又举办了“非遗学学科与教材建设研讨会”,并宣布天津大学非遗学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的成立^[2]。2021年3月1日,教育部正式将非遗保护纳入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设置^[3],非遗学的学科建立迈出了崭新一步。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崛起之时,我国政府会特别重视加强对本国遗产保护,在将考古学纳入一级学科之后,又要将非遗学这一产生时间并不久的新兴学科纳入一级学科,并启动大规模的学科建设呢?显然,与我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而当下既有学科既无法解决非遗科学保护,也无法解决非遗有效利用的紧迫现实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非遗学学科建设已迫在眉睫。

一、非遗作为一笔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值得国家以学科建设的形式高度介入

我们之所以说非遗重要,是因为:从数量上

看,非遗在中华文明中所占比重远超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精英文化。可以说,以活态形式传承下来的文明基本上都可纳入非遗范畴。从质量上看,非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它包含了中华民族最精美的手艺、最高超的科技成就、最经典的叙事方式、最优美的肢体语言、最盛大的民俗活动、最朴实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最能代表中华文明底色的“草根文明”主要体现在这里。从未来前景看,作为一笔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非遗也势必会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快速崛起的最重要的“文化原动力”。正因为它有着如此之高的文化战略地位,我们当然应该动用国家的力量,并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全面介入。

(一)非遗所占比重远超中华文明的“半壁江山”

中华文明是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共同构成的。所谓“精英文化”,是指那些由我国知识阶层创造并以文字传承为基本特征的顶层文化。譬如《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农学家、医学家等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国最权威的历史、最优美的文学、最睿智的思想、最先进的科技成就、最宝贵的农耕经验以及最成熟的医学思想和经典方剂等,主要集中在这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笔重要遗产,我们必须认真继承。与“精英文化”相对应的是“草根文化”。所谓“草

收稿日期 2021-03-16

作者简介 苑利(1958—),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民俗学、农业文化遗产学。

顾军[通讯作者](1963—),女,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民俗学、中国史。

根文化”，从大概率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非遗”。与“精英文化”不同，“草根文化”主要是由艺人、匠人、戏人、说书人、拳师、绣娘、剪花娘子等社会底层文化工作者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其传承所依靠的不是文字，而是人的身体和语言。作为“草根文化”的代表，非遗所涉范围极广，几乎涵盖了与广大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譬如民间文学方面的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表演艺术中的京剧、昆曲、评弹、说书、叙事诗；传统工艺美术中的石雕、木雕、砖雕、玉雕，苏绣、湘绣、蜀绣、粤绣；传统工艺技术中的房屋建造技术、桥梁营造技术、车船制作技术、服饰裁剪技术、食品烹调技术、制糖制酒制醋制酱技术；传统节日中的端午、中秋、重阳、除夕；传统仪式中的祭山祭水等自然神祭祀仪式，关公鲁班等英雄神、行业神祭祀仪式等，都属于非遗。总之，除典籍文献之外的中华优秀文明，只要是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者，均可纳入非遗保护范畴。由此不难看出，非遗在中华文明中所占比重远超我们常说的“半壁江山”。

（二）科技含量最高、技术难度最大的中华文明主要靠非遗来传承

人类文明主要是通过文本、实物与一次次的重复性制作来传承。也许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文本与实物往往会成为人类文明传承方式的首选，因为这样做可使传承成本降至最低。譬如对历史史实的记录、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老样子的保存，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完成。但当人们遇到技术含量更高、技术难度更大的人类文明时，文本与实物传承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候，人们就只能采取一种更笨的方式——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手把手教、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由于这种方式主要是凭借人的身体来传承，所以，人们称之为“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是非遗传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大工业文明到来之前，技术难度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人类文明，如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术、中国传统食品烹饪技术、中国中草药炮制技术、中国中医诊疗技术、中国传统服饰制作技术等，基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代际传承。也就是说，与“精英文化”不同，中国科技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通过“草根”阶层完成的，而这显然与中国历史上重“文”轻“理”的文化传统有关。尽管历史上传统科学技术并未进入我国的“主流教育”，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小视非遗传承人在中国科技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无论是

指南针制造与使用技术、古法造纸技术，还是活字印刷技术、火药制作与使用技术，这些非遗在推动我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指南针，怎会有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怎会有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没有造纸术、印刷术，怎会有唐宋时期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怎会有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快速传播？同样，火药及火药武器的西传还引发了欧洲政治与经济的巨变。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非遗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快速崛起，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知识与技术的快速传播，它在推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天文学、农学、茶学、医学、地理学以及陶瓷、建筑、纺织等领域都曾取得过伟大成就，究其原因，即在于我们拥有数量庞大的掌握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的艺人和匠人，而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三）作为活态遗产的非遗可以为未来的中国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作为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非遗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并在当代发挥重要作用。与博物馆中的文物不同，非遗作为活态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更加直接，这也是非遗与其他类型遗产的不同之处。现实告诉我们：只要保护好浩如烟海的传说故事，我们中国人就能创作出《阿凡提》《渔童》《神笔马良》这样的传世之作；只要保护好悦耳动听的民歌小调、戏曲，我们就能创作出《草原之夜》《说唱脸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经典传唱；只要保护好各大菜系的烹调技术，我们就能烹制出令世界人民羡慕不已的美味佳肴；只要保护好传承至今的祖传秘方，我们就能研究出青蒿素这样的济世良药。且不论以经络学为基础的针灸、按摩、热敷弘扬出来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福音，更何况还有数以十万计的祖传秘方，它们一旦开发出来，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与经济效益是无法想象的。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非遗在文学、艺术以及经济等层面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倘若通过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将中国人优秀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输送出去，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建一个互尊、互爱、和谐、友善、勤奋、努力的“人类共同体”，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由此不难看出，能否继承并利用好非遗这笔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仅关系着中华

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关系着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但是,目前的非遗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而问题的关键主要还是理论建设、特别是学科建设的不足而导致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做好学科建设,使中国的非遗在正确的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得到科学而全面的保护。

二、非遗学可以解决既有学科无法解决的非遗保护难题

究竟需不需要建立非遗学?这是非遗学学科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非遗所涉领域已经有多门学科介入,完全可以用既有学科的既有理论解决非遗保护面临的种种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去构建一门全新学科。但长期的非遗保护实践已经证明,仅凭既有学科的既有理论,是无法指导今天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非遗保护实践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在对非遗本质的理解、非遗遴选标准的设定,还是对非遗保护理念的理解上,既有学科的既有理论都无法全面而准确地解决以上所有问题。

(一)非遗学与既有学科对非遗本质的认知不同

在非遗学看来,非遗首先是“遗产”。所谓“遗产”,它首先应该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而不是当代创造。由于它是在历史上产生,又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所以“遗产”也就具有了只有它才有而当代创作较少有的宝贵的历史认识价值。非遗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人类文明,还可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艺术、新科学、新技术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当然,要想保住非遗的历史认识价值,前提是其必须原汁原味地传承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种改编改造都会影响遗产的真实,都会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信息、文化信息、艺术信息、科技信息的理解和把握。但在艺术学、民俗学、经济学等既有学科视角来看,非遗尽管是在历史上产生,但同时它也是活在当下并服务当下的“遗产”,为适应社会发展而改编改造便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许多非遗项目都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甚至一些当代创作都被当成非遗并进入各级非遗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但无法解释的是,既然是“创新”,既然是“今天”才创作出来的东西,凭什么就一下子变成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了呢?将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与当代人创作出的“现产”混为一谈,甚至干脆用当代人创作出的“现产”替代祖先

留给我们的“遗产”,其结果便是造成中华文明的永久性断流。可见,在“非遗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非遗学与艺术学、民俗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二)非遗学与既有学科对非遗遴选标准的认识不同

在第一批国家级名录中,有75%的项目与艺术有关,这说明艺术学科在发掘非遗审美价值方面具有重要贡献。但是,如果仅从艺术学视角遴选非遗,就很难规避“伪遗产”的流入。艺术学是一门以“审美”见长的学科——无论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老“传统”,还是当代人创造出来的新“传统”,只要具有“传统之美”,就能进入艺术学的研究范围,对非遗的遴选标准也就从非遗学要求的“真不真”,变成了艺术学要求的“美不美”。这样一来,非遗的评审也就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选美”,一些当代创作也正因为“美”而混入名录。而进入名录之后,人们又会根据自己对“美”的理解大规模改造非遗项目,如把庄重舒缓的祭祀舞改造成热辣的霹雳舞,把淳朴写意的传统泥塑改造成西方洋气写实的雕塑等。如果总是以当代的审美、文人的审美审视民间艺术,要想评出真正的非遗,也是一句空话。

(三)非遗学与既有学科对非遗保护理念的理解不同

用民俗学既有理论保护非遗,同样无法做到“原汁原味”的保护。民俗学的研究重视民众、强调田野,熟悉并热爱民间传统,因此很多民俗学家都是中国非遗保护的积极倡导者。对于乡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使他们很少对民间传统“指手画脚”。但民俗学并不排斥来自外界的对于非遗项目的“改造”——无论是来自政府的改造,还是来自学界、商界的改造。原因在于非遗属于“民俗”,而民俗的五大特征之一便是它的“变异性”。既然“民俗”能变,作为民俗一分子的非遗当然也能变。于是,“非遗既要传承,也要创新”便成为这一学科的基本主张。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用民俗学既有理论去保护非遗,其结果必然会因允许改编改造而给非遗带来“改造性”破坏,这显然与非遗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

用经济学既有理论保护非遗,同样无法贯彻“保护优先”这一基本原则。在非遗保护队伍中,还有不少担负着地方GDP增长重任的各级领导,在他们看来,非遗都是行将消失的老传统,要想让它们“起死回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它们引

入市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激活传承人活态传承的积极性。这种做法源于实践,在学理上并不存在太大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味强调“走市场”,又不主动分析“走市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风险同样存在。首先,如果以经济效益为非遗的遴选尺度,选出的很可能就不是真正的非遗,而是已经与传统手工生产完全无关的大机械化生产项目。其次,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如果一味强调经济效益,同样会给非遗保护带来严重破坏。如人们很可能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将“原汁原味”变成“市场需求”,最终将导致真遗产的大面积消亡。

用文物学的既有方法保护非遗也无法做到非遗的“活态”传承。文物学最重视文物的真实性,因此在学理上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介入给中国的非遗保护带来的影响绝对是正能量的。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在本质上都是“文物”,都是认识古代文明、了解祖先历史的重要窗口。文物不能改,非遗当然也不能改,一旦改动,势必会伤害到非遗的历史认知价值。与上述诸学科相比,从文物学的视角出发,更容易理解非遗的本质及其独特价值,也更能够为非遗的真实性保护提供理论支持。但用保护文物的方法保护非遗显然也存在问题,最大问题便是容易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方式与呈现方式上的区别。近年来出现的非遗保护的博物馆化倾向就是典型的一例,这种保护模式很容易将非遗这个“活遗产”变成彻头彻尾的“死遗产”。如为保护京剧,我们可以建京剧博物馆,但我们绝不能用博物馆替代京剧的活态传承。因为京剧进入博物馆后,虽然那些精美的行头、道具可以得到精心保护,但动态的唱腔、肢体语言、伴奏艺术却不会因博物馆的建立而得到应有传承——试想一下,遗产都“死”了,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可见,凭借既有的文物学保护方法保护非遗,是无法保障非遗的活态传承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要想通过既有学科的既有理论解决非遗保护面临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的。要想科学保护非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建立学科,从根本上解决非遗保护科学化问题,而这门学问便是非遗学。

三、非遗学有独特的研究视野与视角

(一)非遗学有独特的研究视野

已经具备独特的研究视野。那么,作为一门新学科的非遗学是否已经具备独特的研究视野?答案是肯定的。有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建立非遗学,因为非遗学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工艺技术,还是传统节日或传统仪式,都已经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表演学、文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近百年深耕。如果一定要建立非遗学,势必会在研究视野上与上述学科产生严重重叠。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非遗学所关注的并不是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已经进入各级名录的部分。非遗学学科建立的目的,一是要认真研究哪些项目可以进入名录而哪些项目不可以;二是要认真研究那些已经进入名录者,之后如何传承、如何管理、如何保护?而这是上述既有学科很少研究的问题。由此可见,非遗学在研究视野上虽与上述学科小有重复,但说到底它是有着独立的、专属于自己的研究空间的。

(二)非遗学有独特的研究视角

在研究视角上,非遗学同样相对独立。在社会科学领域,要想成为独立学科,仅有独特的研究视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独特的研究视角。作为一个学科,即使研究范围大致相同,只要研究视角不同,同样会发现更多的、与众不同的规律。譬如同样是研究传统节日,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节日的历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节日的民俗,宗教学家关注的是节日的仪式,艺术学家关注的是节日的歌舞,而作为一门新学的非遗学,它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上述内容,而是这些节日遗产是不是从历史上传下来的“真遗产”,这份遗产是否被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地继承,在现有的方式下这份遗产能否以活态的形式被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满足第一个条件便可评为非遗,满足第二个条件才能证明传承人确实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传承任务。而上述角度也正是以往诸学科很少关注的。非遗学这门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人类挖掘更多、更好的遗产和更多、更好的传承规律,并将这些规律应用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非遗保护。

四、非遗学有独立的理论架构

非遗学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论架构,这个理论架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什么是非遗;(2)为什么保护非遗;(3)怎么保护非遗。

如果把上述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那么,“什么是”解决的是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为什么”解决的是哲学的价值论问题,而“怎么办”解决的则是哲学的方法论问题。这三大问题是非遗学必须回答而其他学科很少回答或根本无须回答的问题。这三大问题是非遗学的“四梁八柱”,其他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这三大问题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那么,非遗学为什么会提出上述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的提出对非遗学学科建设提供怎样的帮助?

(一)“什么是非遗”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非遗学的研究主体

要想研究非遗,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非遗”。只要涉及“遗产”,人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辨伪”——看看这个“文化事项”到底是“真遗产”还是“假遗产”。事实已经证明,要想把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并不容易。我们所说的“非遗”至少包含以下六大条件。

1.非遗必须以杰出的传承人为支撑。非遗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活态传承,而活态传承的载体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承人。传承人之外所传的非遗并不在政府认定的保护范畴,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非遗”。

2.非遗必须要有悠久历史。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称为“非遗”。

3.非遗必须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非遗是一种活在当下的遗产,最大特点是它的“活态性”。

4.非遗必须以原汁原味的形式传承至今。非遗的最大价值是它的历史认识价值,必须把它当作活在当下的“文物”,并原汁原味地保护起来^[4]。

5.非遗必须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非遗并不是普通的传统文化,而是经过价值衡量之后的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具有重要价值者不能评为非遗。

6.非遗只存在于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等六大领域^[5]。除此之外,没有非遗。

要想回答“什么是非遗”,在非遗学理论框架的设计上,至少要有以下内容作支撑:“非遗概念的界定”“非遗概念界定中存在的问题”“非遗的分类”“非遗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国外非遗保护运动史”“国内非遗保护运动史”等。

(二)“为什么保护非遗”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非遗学的价值

只有将非遗的价值说清楚、讲明白,才能为

非遗保护提供更加充足的理由。

在这部分内容中,非遗价值又可细分为“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由于类型不同,各遗产所含价值的多寡与侧重也会有所不同,有时仅含一种价值,有时同含多种价值。

当然,仅仅知道非遗价值远远不够,因为在价值相同的情况下,还会有品质高低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遗产品质上的优秀度、时间上的跨越度、信息上的承载度、状态上的原生度、社会上的知名度、性格上的独特度以及生存状态上的濒危度等角度,对非遗的价值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判断这些非遗项目整体价值的高与低。

非遗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上述价值的发掘不但可以为保护祖先遗产找出更多理由,同时还可为我们对遗产自身价值的评估作出更为精准的判断。尽管非遗价值客观存在,但同样需要人类不断发掘。可以说,保护遗产过程的本身就是遗产价值再发现、再发掘的过程。非遗价值发掘程度直接关联人类保护非遗的热情,关联一国的前途和命运。

(三)“怎么保护非遗”可以帮助我们掌握非遗学的保护方法

提出“怎么保护非遗”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求这门学科为非遗的科学保护提供更多的学术支撑。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保护非遗,需要从“保护方法”与“保护原则”两个方面回答。

“保护方法”是指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可以从“开展全国性非遗大普查”“建立非遗四级名录体系”“制定非遗传承人登记制度”“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收藏与展示非遗成果”“建立非遗资料库、数据库”“确立非遗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制度”“制定非遗保护法”等几个层面来完成表述。

“保护原则”则是指非遗在保护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可通过“以人为本原则”“整体保护原则”“活态保护原则”“民间事民间办原则”“真实性保护原则”“独特性保护原则”“就地保护原则”以及“濒危遗产优先保护原则”等内容来完成表达。

非遗学是一门具有可操作性的学问。它所强调的是通过对非遗传承规律与保护规律的探索,最终告诉人们怎样保护非遗,这是非遗学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非遗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非遗保护规律是由非遗传承规律决定

的,能否保护好非遗,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真正找到并利用好非遗传承规律,这十分重要。

以上三大问题仅仅是非遗学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还会衍生出许多其他内容。如作为活态遗产,非遗是需要人来保护来传承的,这就会涉及“非遗保护主体”与“非遗传承主体”两方面内容,其中,前者还会重点讨论“非遗保护主体的构成”“非遗保护主体的基本职能”以及“非遗保护主体的素质要求”等方面内容;而后者还涉及“非遗传承主体的界定”“非遗传承主体的职能”以及“针对传承主体的几种激励机制”等方面内容。

当然,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非遗学还会涉及“非遗的普查与申报、开发与经营”等诸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在非遗学中都会有深入阐述。

[1]冯骥才认为,在当前的非遗保护工作中,“科学保护是根本”“人才培养是关键”。

[2]委员会主任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担任,教育部高校设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大学特聘教授向云驹担任副主任。专家委

员会成员还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建民、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顾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发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德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赵屹、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郑刚、天津大学文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和人文社科处处长张俊艳、天津大学教授张加万、天津大学教授张春彦、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论坛》副主编冯莉。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授郭平担任秘书长。

[3]《教育部:37个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网,[EB/OL][2021-03-01][2021-04-29]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1/03-01/9421656.shtml>.

[4]“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但“活态传承”并不是让它“变”,而是让它“不变”。这里我们所说的“活态传承”是指让传承人通过一则又一则故事的讲述、一首又一首民歌的演唱、一尊又一尊塑像的制作,把这些古老的手艺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并传承下去。

[5]分类方式不同,所分种类也有一定差别。如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将非遗分为11个大类,国家文化部(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将非遗分为10个大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非遗分为6个大类。与上述分类法相比,六分法的涵盖范围更广。

Some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YUAN Li¹ GU Jun²

(1.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2.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has become a topic of discussi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should focus on “original” and “living”. China is rich in intangible heritage resources, b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tangible heritage studies is not able to provide strong academic support for practices. Intangible heritage studies have more than one century of academic accumulation and have been taught in universities for over ten years. It h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cademic perspective and vision from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ll these provide possibilities for intangible heritage studies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disciplin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intangible heritage protection; living heritage; originality; academic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